

文理学院的死与生：自由教育与制度化的精英大学体系

崔乃文

(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文理学院是西方大学为本科生进行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组织。19世纪的欧洲大学体系经历了古今之变,同源於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的文理学院在欧陆和英国遭遇了死与生的迥异命运。研究发现,由于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套不同的制度逻辑及相应的制度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欧洲文理学院的演变呈现了制度渐进变迁的四种理想类型,而文理学院和自由教育的存在形态取决于它与制度化的精英大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当前者与后者相龃龉,产生“制度漂移”,导致文理学院与精英大学体系的脱耦、依附或相斥关系;当前者与后者必须共存,新旧制度逻辑协调平衡,出现“制度叠置”,衍生出融合古典文理学院与现代专业院系的新组织体系;当现代专业教育重新定义了人们对大学的共同认知,自由教育被除魅,仅仅被理解为专业教育的基础教育,则文理学院从被“转换”走向被“替换”。四种理想类型几乎呈现了文理学院命运的全部可能性。

关键词:文理学院;自由教育;精英大学体系;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8)05-0081-09

DOI:10.14138/j.1001-4519.2018.05.008109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前后是欧洲大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大变革时期,也是欧洲精英大学体系产生重大分化的时期,即从中世纪大学体系分化为现代的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体系与以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而在欧陆内部又存在德国和法国精英大学体系的分化。从组织学的视角看,19世纪的大学体系分化具有双重历史意义:第一,奠定了欧洲精英大学的基本格局与组织模式,并延续至今,如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体系,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简称“牛桥”)体系;第二,它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甚至可以说,两大体系构成了世界精英高等教育组织体系的基本模式,其余大学是在这两大体系基础上的模仿、修补与创新。^①而这两大体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对古典文理学院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②在法国,巴黎大学的艺学院被“革命”摧毁,大革命之后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者以“文理学院”的形式重建艺学院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在德国,哲学院则被现代科学专业教育的组织所不断蚕食,最终被分

收稿日期:2018-04-18

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组织创新机制研究”(16YJC880007);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欧美大学自由教育组织变迁的比较分析”(XJJ2015-26)

作者简介:崔乃文,山东青岛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学校组织与制度。

①吕埃格.欧洲大学史[M].张斌贤等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160-234.

②文理学院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大学体系中存在称谓上的差异,中世纪巴黎大学称“艺学院”,文艺复兴中德国大学将艺学院改称为“哲学院”,牛桥仿照巴黎大学建立,其文理学院直接称为学院,美国的文理学院则是由牛桥的知识分子建立。这些学院传承关系与脉络清晰,性质与功能一致,按照当前称谓习惯,可以统称为“文理学院”。有学者将巴黎大学艺学院直接翻译为“文理学院”,参见渠敬东.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J].社会,2017,37(1):27.

解;而英国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现代专业教育在进入古典大学之时遭遇古典自由教育和寄宿文理学院的抵抗,而直到20世纪早期,英国的牛桥两所古典大学才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向,并形成了寄宿文理学院与专业院系共存的局面。因此,本文以欧洲两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例,提出这一问题:同源於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文理学院,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何遭遇了欧陆和英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文献述评

这一部分试图从中西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梳理与抽出一条与核心问题紧密关联的文献脉络。阿伦·阿维拉姆和梅尔茨等人在理念层面进行了自由教育观念的国别研究,指出了自由教育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阿维拉姆首先比较了德国和法国的差异,他指出19世纪德国大学自由教育中“研究”的概念与现代科学与实证主义支配的研究概念不同,它反映的是新人文主义者的学术观,是基于理解自身与其他文化的努力,与个体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过程相关。而大革命后的法国高等教育则是真正的实证主义科学概念,且大学目标、研究方法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然后他又对比了英国和德国,认为英国大学传统的自由教育与19世纪德国新人文主义具有本质不同。在英国的自由教育概念中,个体根据明确的培养模式接受所谓“绅士”教育,个体在自由教育中扮演消极角色,他必须内化文化的基本结构并据此形塑自己的生活和观念。相比之下,在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概念中,目标并未预先设定,教育是个体自我设计的过程,自由教育培养学生通过学术创新达到修养。^①而本一戴维、威廉·克拉克等人则在组织层面进行了论述,根据本一戴维的国际比较研究,哲学院的变革主要源于大学外部所形成的“分权化竞争”市场,大学间现代科学研究的市场竞争导致学科分化,瓦解了哲学院的统一建制^②;威廉·克拉克则在本一戴维的分析范式与框架中进行了更加微观的历史比较分析,他把后者的解释路径进一步提炼为“管理资本主义”,其核心观点是专业化的官僚体制和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现代专业教育和学术制度取代古典自由教育组织的核心机制。^③国内学者余东升等人则基于本一戴维和伯顿·克拉克等人的研究明确提出了文理学院在现代大学中的命运差异问题,并从传统组织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解释,认为英美大学在变革时代对组织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与塑造,从正式结构上保障了自由教育与文理学院对现代大学的兼容。^④但该研究没有将文理学院进一步作为一种制度来分析,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挖掘和阐释仍有延展空间。在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中,研究者在解释美国文理学院的演变时认为,殖民地时期的古典文理学院之所以能够融入现代大学,不仅仅是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创新,更是因为它具有与制度环境相容的合法性身份,即它是贵族与精英通过自由教育进行再生产的教育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⑤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存在两个基本缺陷:第一,依赖于传统的制度分析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思路,将文理学院的变革主要归于外部动因,强调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于组织变革的决定性意义。这一分析路径无法很好地解释变革的差异,即文理学院的演变为什么存在欧陆和英国的差异?而欧陆内部为什么又存在德国和法国的差异?法国巴黎大学体系重建文理学院的努力为什么最终走向失败?这些差异实际上都是由制度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导致的。第二,更多地将文理学院看做一种组织,而未看做一种制度。把文理学院看做一种组织,能够解释现代大学是如何通过组织结构变革或纳入或拒斥自由教育和文理学院的。但其不足在于,传统的组织理论过于重视组织的正式结构,它无法面对组织正式结

① Aharon Aviram, "The Humanist 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ity: A Framework for Post-Modern Higher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no. 4(1992): 397-414.

② Joseph Ben-David and Abraham Zloczower,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3(1962): 49.

③ 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449.

④ 余东升, 崔乃文. 自由教育: 学院组织的历史考察[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10): 96-102.

⑤ 崔乃文. 文理学院模式为什么独存于美国大学体系[J]. 复旦教育论坛, 2018, (2): 54-60.

构的无效性问题,即不能很好地解释即便存在文理学院这样的实体,但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依然难以有效实施这一现象。

三、分析框架:两种制度逻辑的对抗

组织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将制度分为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三种表现形式和基础要素,其中,组织分析的制度学派特别强调第三类要素,认为它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①,本研究主要在组织分析的制度学派的意义上理解制度和制度化,将文理学院和精英大学体系看做一种制度。具体到内容上,欧洲大学的古今演变之际,自由教育和现代专业教育构成一组主要矛盾,它们对应两套不同的制度逻辑和要素组合。在古典大学中,自由教育的制度逻辑占据主导地位:自由教育是制度化的大学体系的核心,人们对于大学的文化—认知是由自由教育所塑造的;反映在规范性要素层面,自由教育具有浓厚的德性意义,大学在育人上的价值观念是培养有教养的贵族,即认为大学是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与品格塑造,从而培养有古典教养的人,而这些人构成了国家统治阶层;在规制层面体现为围绕自由教育形成的结构,即以文理学院为核心的组织正式结构。而在欧陆现代研究型大学,专业教育的制度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于大学的文化—认知是由学术性专业教育(德国)或职业性专业教育(法国)所塑造的;反映在规范性要素上,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就是培养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人才和社会职业的专业从业者;在规制层面则体现为围绕专业教育形成的大学组织结构,即以实验室、研究所或专业院系为主体的松散联合的结构。文理学院在欧陆与英国的不同命运,是因为他们对这两种制度逻辑和要素的处理方式不同。而演变的结果,最终还是要看这些要素与制度化的大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四、欧洲精英大学文理学院演变的过程与理想类型

凯瑟琳·茜伦和詹姆斯·马哈尼提炼了内部要素导致制度变迁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制度的转换(conversation)、替换(displacement)、漂移(drift)和叠置(layering)^②。这四类方式揭示了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所导致的制度渐进变迁的路径与结果不同,可以用这四种类型来描述欧洲大学文理学院演变的基本过程。

1. 从制度转换到制度替换:德国大学文理学院的解体

所谓制度转换,是指组织在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原初目标与功能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导致旧制度履行新功能的情形;所谓制度替换,是指制度由复合要素构成,且在特定期限旧的制度被新的制度所替代的现象。这是由于既有制度形态出现局限性,被压制的要素被激活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导致组织制度的变革。德国古典大学的文理学院,即哲学院的演变先后经历了这两个过程。柏林大学建校之后,哲学院仍然以古典自由教育为主,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洪堡理念实际是自由教育在德国的一个本土化的“变种”^③。但哲学院中一直存在现代科学的因素,例如被认为是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兰克历史学和李比希的化学,都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当自然科学家通过大辩论战胜唯心主义哲学家,将现代学术的专业教育在哲学院中完全确立之后,哲学院的主要功能就由古典自由教育逐渐转换为现代学术的专门化研究,传统的学术组织讲座制这样一种为古典自由教育而设计的小而精、师徒式的古典教学组织来履行现代学术研究的新功能,即围绕讲座制设置了研究所和实验室,形成了“制度转换”的局面。

① 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 姚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5.

② James Mahoney and Katherine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 - 18.

③ 伯顿·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3.

而制度转换有可能带来“制度替换”,这一创造性的替换过程实际并不源于改革先锋柏林大学,而是由吉森大学完成的。吉森大学的化学家李比希为在德国大学推广与完善现代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创造了以学生实验为主体的专业教育和实验教育制度,即在教授指导下进行专门化、独创性科学研究,成果获得认可之后即可被授予博士学位。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李比希将这种专业教学模式确定下来。至19世纪中期,吉森大学成为自然科学教育特别是化学教育的“麦加”,被德国其他大学的化学讲座广泛模仿,而且逐渐向自然科学其他各学科扩散。到19世纪70年代,包括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马尔堡大学等德国各大学基本都确立了李比希的吉森模式。^①吉森模式的扩散使德国大学完成了“制度替换”的过程,现代科学的专业教育及其制度完全替代了古典自由教育。最终,这些以实验室为主的专业教育与研究组织瓦解了哲学院的统一建制,导致德国大学的基层结构不再如中世纪大学一样是一个统一的文理学院,而是以松散联合的专业院系为主体,现在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这一结构适应了专业教育与专门化的研究,但它无法再如文理学院那样包容自由教育的制度逻辑。因此,作为大学基础文理教育的自由教育被调整至中等教育层次,由德国中等教育结构中的一类精英学校,即文理中学来承担。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陆体系,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自由教育的。

2. 制度漂移:巴黎大学重建文理学院的失败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以高等专科学校(大学校)为主体的精英大学体系,不像德国哲学院逐渐被专业教育及其制度逻辑所蚕食与分解,艺学院是在高等教育的革命中被直接取消的,理由是艺学院代表了传统巴黎大学不合时宜的古旧精神,必须通过革命直接摧毁,然后建立能够服务于新生共和国经济发展、以专门职业教育为主体的高等学校体系。但是,艺学院被摧毁之后,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者们重建艺学院的呼声从未停止过,他们认为专门职业教育过于功利化,大学丧失了传统艺学院心智训练和纯粹学术研究的理念与理想,而只有后者才构成高等教育的本质。然而,这些改革者在巴黎大学重建艺学院的努力最终失败,这一过程反映了“制度漂移”的特点。制度的萎缩或衰退也是制度的重大变革,而制度漂移解释的就是这一现象,它是指新制度没有适应制度化的组织体系,因而无法很好地履行新功能,这导致新制度的边缘化乃至无效。

艺学院的重建始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政府以所谓“文理学院”的名称恢复了艺学院,试图重建其文理基础教育的职能。这类学院以“facul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的名称和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在名义上,艺学院分裂为两个机构,即理学院(faculty of sciences)和文学院(faculty of letters),它们被统称为所谓“文理学院”。而这个文理学院仅仅是一种翻译方式上的直译,它与美国的文理学院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专业学院”的形式变为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五个学院的结构。虽然在组织结构上大同小异,但与古典巴黎大学模式相去甚远。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个所谓的“文理学院”甚至难以称为是一个教育机构。^②“文理学院”与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的唯一联系也许仅仅是作为国立中学和中央管理部门的附属机构。从功能上看,它是一个考试管理和学位授予的组织,它承担中学毕业考试、学士学位考试和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向学生颁发学士学位或教师资格证书。获得证书之后可以在国立中学(高中)或市立中学(初中)任教。^③因此,“文理学院”在性质上更多是一个管理机构,并非大学教学机构;且相对于大学,它与中学的关系更加密切。^④而巴黎大学在整个19世纪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组织,它们被分解为各个独立的专业学院。自19世纪60年代,法国学界重建大

① 古川安.科学的社会史: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M].杨舰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88-91.

② Joseph Ben-David, *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7), 16.

③ 杨少琳.法国学位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44.

④ Walter Ruggie,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II: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4-47.

学的呼声渐高。输掉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大学者们聚集在法兰西学院开会,他们认为是德国的大学打败了法国,并哀叹“法国根本没有高等教育”。

而重建大学的核心就是重建艺术学院^①,学者们认为应将原先的“文理学院”重新打造成为心智规训和纯粹理论研究的组织。^②但是直到1896年法国政府共新建了16所大学^③,这些大学实际也只是在形式上恢复了巴黎大学的模式,它的“文理学院”依然是个负责中学考试的机构,而最好的高等教育组织还是大学之外的高等专科学校,学院仍是独立的实体,其联合只是表面的。^④伯顿·克拉克转引了一位法国学者对19世纪至20世纪法国大学的分析:“帝国大学过去是,现在仍然主要是一个法律上的虚体机构……每一个学部保护它自己的利益,安排它的预算,并且在公共教学部允许的范围内安排它自己的课程……帝国大学是一个名词,它完全缺乏实质。今天,在世纪之交有真正的社会存在的是一个个学部”^⑤。也就是说,法国大学即便在其重建之后,本质上依然是由各个专业院所组成的松散联邦,这是全世界深受欧陆体系影响的大学在组织架构上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框架之下,重建艺术学院不仅仅在组织结构上难以处理它与各专业院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专业教育已经完成了人们对于大学的文化认知与共同理解的塑造,这意味着艺术学院这类自由教育组织难以在现代大学中重塑身份认同,所以即便它获得了文理学院这一实体性外壳,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的自由教育功能,甚至无法在欧陆体系中生存。因此,跟德国一样,法国将大学的基础文理教育或自由教育以高中教育的延伸形式孤置于精英大学体系之外,在精英高级中学里设计“预科班”制度,在学习时段上,预科班教育相当于英美大学一、二年级的通识教育阶段。而且在学习内容上,预科班虽然是在高中,但学习的完全是大学水平的基础文理课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人们觉得互联网上流传的法国一流大学的高考题目难度很大的原因。欧陆体系的大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他们难以处理的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问题。

3. 制度叠置:盎格鲁-撒克逊大学体系寄宿文理学院的现代新生

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古典大学是欧洲精英大学体系在变革过程中唯一保留了古典式寄宿文理学院组织的大学,变革过程反映了“制度叠置”的特点。所谓制度叠置是指在旧制度中引入一些新要素,并对既有制度进行修改,其特点是差别化发展:第一,新的因素不会对旧制度构成根本威胁,因此不会引起旧制度的强烈抵制;第二,新旧要素毕竟存在差异,因此需要相互协调甚至融合,最终逐渐导致制度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现代专业教育的引入,并没有与传统寄宿学院的自由教育体系形成你死我活的根本对立。变革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是新的专业院系叠加在传统的寄宿学院之上的两层正式结构。

与欧陆大学不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校具有强大的学院传统,因此,现代专业教育及其建制在牛桥中出现的时间也相对较晚,19世纪中后期大学通过考试与学位制度改革,确立了现代学术,出现了古典自由教育与现代科学并存的局面。^⑥而现代专业教育的组织制度(包括学部、学系等)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设立则是在20世纪初期,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才产生了成体系的学术性专业教育制度与组织结构。例如剑桥大学1919年才设立博士学位,而1926年的《剑桥大学校规》中,学系这一制度才被剑桥大学官方承认。现代专业教育出现之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形成了学院和大学的双层结构。在牛津大学,寄宿文理学院是英国传统的自由教育组织,大学则由人文学科、社会科

① Theodore Zeldin, "Higher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 - 194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3 (1967): 57.

② 伯顿·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07.

③ Walter Ru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II: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 - 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5.

④ Theodore Zeldin, "Higher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 - 194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3 (1967): 53.

⑤ 伯顿·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08 - 109.

⑥ Alex Duke, *Importing Oxbridge: English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四大学术部门组成,每个学术部门中都围绕专门学科和领域设立若干学系、学部或专业学院。学院是学生共同生活与道德教育的场所,主要功能是自由教育,其核心制度是“导师制”;而大学负责统一考试与学位授予,大学各个学部、学系和学院负责各学科与专业的教学和学术研究。^①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师生既是大学和专门化的院系机构的成员,又是学院的成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指出的,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有两个独立又交叉的空间、两套支持体系、两个平行的学术和社交世界。^② 学者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即学院院士和大学学部的成员。^③ 作为学院的成员,学者经由导师制对学生进行自由教育,通过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辅导与监督,训练学生的心智能力,通过师生亲密关系、言传身教塑造学生的道德人格;而作为大学的成员,学者是基础理论学科的专业研究者。对于这种结构和理念,英国历史学家谢尔顿·罗斯布莱特以剑桥大学为例,论述道:“剑桥大学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所具有双重教学结构的学院式大学。剑桥大学的教育既是大学的,又是学院的。前者以专业教育为目标,后者关注品格塑造。同一批学者要承担两类教学”,“学者们认为,理想的教育是两者的融合,专业知识和健全人格是专业人士的特质。剑桥大学所培养的领袖必须接受双重教育:大学教育使其成为优秀的职业从业者,学院教育使其具备博雅的文化 and 优雅的社交才能。”^④ 总之,英国正是通过制度叠置,形成了罗斯布莱特所言的双重教学结构,将寄宿文理学院从正式结构上融入现代大学。

五、文理学院四种制度现象的发生机制

从制度替换到制度转换,是文理学院被蚕食并走向消亡的过程;制度漂移则描述了欧陆大学体系意图重建文理学院而最终失败的结果;制度叠置则是文理学院融入现代大学体系的过程。四种类型几乎涵盖了文理学院命运的全部可能性。而这四类制度现象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茜伦和马哈尼等人只是描述了制度渐进变迁的这四种理想类型,且只浮光掠影地解释了这是由于组织内部不同制度要素与逻辑的排列组合不同导致的,并未说明其发生机制到底是什么。因此,这里试图对其中的因果机制做进一步分析。

文理学院的演变不仅仅是组织结构上的,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制度上的。如前文所言,组织分析的制度学派将制度化的过程主要看作是一种文化—认知过程。根据迈耶等人的界定,制度化的组织体系是被建构为仪式或神话的正式结构。^⑤ 制度化的大学体系内含某种认知图式,它塑造了人们对大学本质的共同理解与认识,使人们自觉遵从建立于文化—认知基础上的秩序。例如,在古典大学中,古典自由教育定义了人们对大学的文化—认知,即便是法、神、医三个专业学院的性质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大学的专业教育,它们并不传授职业技能,仍然以自由教育为主,经由自由知识的心智训练和形式教育所获得的语言、辩论与逻辑分析能力可以胜任所有教会与政府机构的职位。教育史家哈罗德·珀金以医学院为例,指出教师和学生主要专注于医学经典的研讨,完全不会进行临床技术的学习与训练。^⑥ 而欧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则是专业教育,认为大学是“理所当然”的进行专业教育的场所。总之,文理学院的变革本质上是制度性的变革,因而它与制度化的大学体系也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文理学院演变中的制度现象做如下解释。

① John Ziman, "The College System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Minerva*, no. 2(1963): 191 - 208.

② 麦克法兰.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M]. 管可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71.

③ Ted Tapper and David Palfreyman, "Understanding Collegiality: The Changing Oxbridge Model," *Tertiary Education & Management*, no. 3(2002): 47 - 63.

④ Shelton Rothblatt, *The Revolution of the Dons: Cambridge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CUP Archive, 1981), 257.

⑤ 沃尔特·鲍威尔等.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 姚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5 - 67.

⑥ Stephen C. Ferruolo, "Quid dant Artes nisi Luctum?: Learning, Ambition, and Careers in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no. 1(1988): 1 - 22.

1. 解释制度转换与替换:文理学院如何被去制度化?

第一,制度转换是旧组织不得不继续履行新功能的制度现象,这一现象的机制是规范性要素开始发生改变,即学者的价值观念或人们对于大学的社会期待开始转变,但这种转变既没办法引起组织结构的重大的变革,也不足以导致大学中文化—认知要素的根本改变。因此,新的功能和组织或者必须在传统的院系结构之外建设,或者必须依附于传统的体系,例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大学中的现代科学研究对于传统讲座制度的依附。

第二,制度转换演变为制度替换的条件和机制是新的功能和要素必须足够强大,才能逐渐替换旧制度,导致旧的组织与制度的根本变革。这就要求新的规范性要素被建构为文化—认知要素,即这些价值观念或社会期望不再仅仅是部分行动者所主观认同的价值,而是被客观化为一种社会事实或符号,使得大学的秩序与本质产生了根本变化。李比希等自然科学家的现代研究观念在古典大学中以规范性要素的形式存在,科学家们通过大论战几乎将唯心主义哲学驱逐出哲学院之后,现代科学的专业教育与专门化研究才成为大学“理所当然”的职能。

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此消彼长,源于自由教育在欧陆现代大学中遭遇的一个重大境况,即自由教育的除魅。制度化的组织体系往往蕴含某种神圣性,所以迈耶等人将其称之为神话或仪式。欧陆古典自由教育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核心与本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被赋予的神圣性。这种对自由教育的神圣性赋魅在欧洲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源于古希腊,自由教育在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形式主要是七艺,其中的前三科特别是逻辑(辩证法),被古希腊人认为是神的语言,它具有公共性,由人类共享,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所规定的。所以逻各斯被称为神圣的逻各斯,是神在说话。^①第二次浪潮是在文艺复兴,它赋予了自由教育“人文”的德性意义,彰显了涂尔干所说的“人的自然”,自由教育的目的是达到人格上的完满。也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艺学院被德国大学改称为哲学院;第三次浪潮是19世纪初期,洪堡和施莱尔马赫等人所提出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和改革实践,是欧陆大学通过革新来保持自由教育德性意义与传统的最后一次努力,即所谓的“通过学术达到修养”,是自由教育神圣性的最后一曲挽歌。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过程被自然科学的崛起所中断,现代科学研究转而成为学者毕生的事业而被赋予了神圣性。除魅后的自由教育,在欧陆体系中不再具有传统的宗教和人文层面的德性意义,也不再构成塑造人们对大学共同认识的文化符号,在教育实践中更多仅被理解为基础教育。自由教育的除魅过程,实际就是它被去制度化的过程。

2. 解释制度漂移:欧陆大学体系为何难以重建文理学院?

制度漂移所解释的是组织的变革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从而导致新制度失败的现象,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学术模式国际间的迁移”中^②,当大学不管主动或被动接受某种组织模式之时,组织可能只是在规制性和规范性两个层面发生部分变化,即部分行动者的价值观念和期待转化为组织正式结构的变化,但整个组织的文化—认知要素并没有改变,组织的基本性质一如既往,从而导致新制度或者游离于整个组织体系,处于边缘地位,或者改革陷入无效。巴黎大学重建艺学院的失败,就是源于大革命之后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本质是由专业教育规定的,传统的艺学院无法融入这一制度化的体系,所以基础文理教育只能游离于大学之外,在精英高级中学以预科班的形式存在。

总体而言,文理学院及其自由教育由于与制度化的精英大学体系相龃龉,其存在形态具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脱耦,就是自由教育的观念依然存在,但自由教育的载体即文理学院形存实亡;二是依附,就是在以专业教育为主的体系中,自由教育依附于专业教育,它仅仅被理解为专业教育的基础教育,不再具备古典自由教育培养有教养之人那厚重的德性意义,它以基础课程的形态存在于专业教育体系之中,其存在

① 邓晓芒. 哲学起步[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3.

②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 253.

的正当性由专业教育所赋予。例如,19世纪70年代柏林大学重要的改革者、大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曾主张不能撤销哲学院,理由是哲学院的自由教育能够为专业教育提供坚实的知识与智力基础,且一个统一的哲学院有利于学科交叉。^①可见,赫尔姆霍茨所理解的自由教育已经与洪堡的理解存在质的差异,在前者那里,自由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基础部分;又如本一戴维指出,在法国,支持通识教育的跨学科课程反而仅存于顶尖的高等专科学校体系之中^②;三是拒斥,即自由教育的理念和组织实体都被排除在大学体系之外。三种可能都指向同一种命运,就是传统的文理学院无法存在于制度化的大学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欧陆文理学院的消亡不仅仅是去组织化即组织结构的消亡,更是去制度化的过程,即文理学院作为一种制度被取消。甚至,去制度化并不必然同时伴随组织的瓦解,组织实体有可能依然存在,但它无法对组织的运行与制度的变迁产生实质影响。

3. 解释制度叠置:寄宿文理学院为何依然是牛桥的中心?

制度叠置源于旧制度过于强大,但是组织又不得不履行新功能,所以只能将新制度叠加在旧制度之上,这种叠加并无办法也不可能是简单叠置的,两者必然在组织内部相互协调、互补和冲突,最终导致制度变迁。多重制度逻辑的并立,在组织结构上的体现就是制度叠置的现象。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自由教育和寄宿文理学院至今都是主导性的制度逻辑,因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寄宿学院一直是英国贵族再生产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欧陆在革命中摧毁了传统的贵族,英国的贵族和绅士精神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寄宿学院作为再生产贵族的结构自然也得以传承。也就是说,自由教育在英国实际未被除魅,它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依然具有强烈的德性意义和符号特性。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现任院长路易斯甚至明言,在牛津高贵与特权是顺其自然的。^③麦克法兰把学院的性质界定为“共同体”。在共同体中,学生共同居住,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以贵族情感和共同信仰为纽带,源源不断地再生产贵族阶层。只不过,古代贵族身份的获得依赖于出生和血缘,而在现代精英大学中,贵族身份源于学院共同体的成员身份。^④现代大学进行专业教育的学系则区别于学院共同体,其性质被麦克法兰界定为“结社”,它是基于对于某一专业或学科的共同兴趣和目标成立的官方机构,以契约为纽带,区别于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和身份纽带。^⑤由此可见,制度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大学体系是由自由教育和寄宿文理学院所共同界定的。因此,现代专业教育及其制度逻辑的介入无法动摇传统学院的地位,而只能寻求与后者的协调与共存,由此产生了制度叠置的现象,甚至在招生录取时考生必须被学院共同体所接纳,才能进入学系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

六、结论

四种制度现象呈现了古典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文理学院命运的几乎全部可能性。第一,德国大学文理学院的演变是一个从“制度转换”走向“制度替换”的过程,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在其诞生之初依附于古典自由教育的讲座制度,而李比希吉森模式在德国大学的扩散完成了专门化的学术研究体系对于自由教育组织的替换。现代专业教育被建构为大学新的文化—认知要素,它重新定义了大学本质,自由教育被除魅和去制度化,并仅仅被理解为专业教育的基础部分,传统文理学院瓦解。第二,巴黎大学重建文理学院的失败,其本质是文理学院无法融入以专业院系为主体的制度化的大学体系之中,两者相互龃龉,产生

① Hermann Von Helmholtz, "On the Relation of Nature Science to Science in General," in edited by Emil Du Bois - Reymond. *Über Universitätseinrichtungen* (Berlin: Rektoratsrede, 1869), 25 - 32.

② Joseph Ben - David, *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7), 38 - 39.

③ 蒲实,陈赛,大学的精神[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227 - 228.

④ 麦克法兰,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M].管可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51 - 152.

⑤ 同上,167 - 170.

“制度漂移”，导致自由教育和文理学院与精英大学之间的脱耦、依附或拒斥关系。所谓脱耦，是指法国乃至欧陆大学虽然仍存在自由教育的理念，但自由教育的组织实体文理学院名存实亡；所谓依附，是指自由教育仅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础部分，依附于专业教育体系之中，其存在的合法性是由专业教育所规定的；所谓拒斥，是指自由教育的理念和组织都无法融入制度化的大学体系中。第三，英国古典大学则与欧陆大学完全不同，自由教育和寄宿文理学院一直是主导性的制度逻辑，因此，大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专业院系必须与这套制度逻辑共处与平衡，在组织变革层面反映为寄宿文理学院与现代专业院系相互协调，形成所谓“双重教学结构”的组织形态。总体而言，虽然文理学院在欧陆和英国的命运截然不同，但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即文理学院及其自由教育的存在形态取决于它与制度化的精英大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The Death and Survival of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Elite University System

CUI Nai-we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Abstract: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is an institute of liberal education or general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The 19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in European university systems. The facult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oth origin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the Middle Ages, encountered the different fate of death and survival. This study finds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action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between lib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facult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presents four ideal types of gradual changes in institutions, and the forms of the faculties and the liberal education depends o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institutionalized elite university systems.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m, a “institution drift” emerges, leading to the decoupling, attachment, or repuls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elite university system. When a coexist is in demand, the logic of the old and new systems is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The emergence of “institution layering” leads to a new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at merges classical colleges with modern professional schools. When moder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defines people’s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ities, liberal education is derogated and be considered only as the basic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n the facult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face the fate of being “displaced” instead of being “converted.” The four ideal types represent almost all the possible fates of the facult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Key words: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iberal education; elite universi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ed